

个性理论:密尔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的超越

桂琳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以边沁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具有一种还原论取向,密尔接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及欧陆哲学的影响,克服功利主义只重视分析方法的唯科学主义及决定论倾向,开始重视人的内心修养、意志自由等问题,把“自由选择与自由试验”的能力作为其人性观的基础,发展出不同于边沁式功利主义的“个性”理论。这种个性理论成为他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功利主义;密尔;意志自由;个性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2-0114-04

Individuality: Beyond Bentham's Utilitarianism

GUI L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utilitarianism represented by Jeremy Bentham has a reductionist orientation. John Stuart Mill accepted the British Romantic literature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He overcame the tendency of the analytical methods and determinism of utilitarianism and stresse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human heart and free will. His basis on human nature is the ability of free choice and experiment. He developed the Individual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Jeremy Bentham's utilitarianism, as the basis of his theory of liberalism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Key words: utilitarianism; John Stuart Mill; free will; individuality

以边沁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虽然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自诞生以来,它也屡屡为人诟病。它所受到的指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支持多数人的统治,这容易忽视少数人的正当权利,至少听起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多数人的暴政”;二是功利主义的还原论倾向于把人性归结为追求快乐,而又把快乐同质化,归结为感性快乐、肉身的快乐,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在这种快乐的支配下。这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人性观,它看不到人还有超出物欲的崇高的道义理想,看不到人有各不相同的个性追求——并不是同质的,所以这是一种庸俗的“猪的哲

学”。^[1]而这样的人性观的哲学基础,又在于它把人的一切都被看作是被决定的,它看不到人是有意志自由的,意志自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它使人摆脱了动物性的、完全被自然欲望、自然规律决定的存在方式,而有了道德、自由、个性、创造等种种属性。这些指责长期以来被不断重复,使功利主义名声不佳。

但是,功利主义哲学阵营本身是复杂的,上述指责对于边沁大体合适,但却不适合于功利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密尔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的上述弊端有充分认识,他以“个性”理论扬弃了边沁式功利主义,使功利主义发

收稿日期:2011-12-12

作者简介:桂琳(1978-),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研究。

展到一个新阶段。然而,他的这种发展,又使功利主义的面貌渐趋模糊,同时也使他个人的理论体系出现某些混沌。

一 密尔的精神危机

密尔是他的父亲詹姆斯·密尔和他的老师边沁精心培养出来的功利主义接班人。据说密尔5岁会希腊文,10岁会代数和拉丁文,到12岁时便拥有极端博学的30岁人的学问。成年的密尔拥有“寂静甚至冷酷的外表”与“就像蒸汽机在工作一样进行推理的大脑”,他活跃于思想界,成为师友们的骄傲。所以他父亲的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他成功地制造了一个知识广博而完全理性的生物。边沁教育理念的真理得到了彻底的证明。”^[2]但密尔在成年后,在他形成自己独立思想的时候,却偏离了边沁和他父亲设定的路线,功利主义在他的手里得到重大改造,一改以前的简单明了、一以贯之的风格,变得复杂起来。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潮本身带有典型的唯科学主义色彩。边沁就力图把道德哲学变得象自然科学一样客观、准确,他说:“由于这一原理(注:即计算快乐与幸福的原理),数学计算的精确性、清晰性和肯定性才第一次被引入道德领域。就其自身性质来说,一旦弄清楚之后,它和物理学(包括它的最高级部分:数学)同样无可争辩地可以具有这些性质。”^[3]在他那里,人性、道德都变得极为简单,就是一种同质的快乐的分解、组合。所以在当时,边沁与詹姆斯·密尔等功利论者就经常被人视为一些感觉粗糙、缺乏艺术欣赏能力的人。而事实上,边沁真正感兴趣的、毕生致力的工作是外在的社会改革、法律改革,他对人性、道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这些改革作论证的,人的内在的情感、修养等问题并未真正引起他的重视。^{[4]99-100}这是功利主义的一个软肋。到密尔那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据密尔自述,从1826年,就是密尔20岁那年的秋天开始,几年内他数次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他感到情感匮乏、意志瘫痪,生活失去了动力,“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5]86}密尔心灵敏感,艺术品味比较高,但在他受教育的青春年代,却被

有意识地与宗教、形而上学、诗歌等隔绝,边沁认为这些东西是人类愚蠢与错误的集合。边沁式的教育使密尔认为,生活的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5]82}但二十几岁的密尔却发现:“对于我曾经努力争取的目的,现在已没有真正欲望。”^{[5]86}在这样的困顿中,密尔开始接触那些与他从前相隔绝的思想、艺术。他阅读科尔里奇(S. T. Coleridge)、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尤其是从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得到感情的陶冶:“夕阳映红晚霞的美丽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感情,并不妨碍我认识云是水蒸汽,受悬浮状态中水蒸汽的规律的支配”。^{[5]93}他还阅读卡莱尔的著作,并与之交往,对欧陆思想也开始大量接触,如歌德、洪堡、圣西门、孔德等人的思想。这一番的阅读、交游使他获得灵感,从而走出精神危机,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

他认识到功利主义只重视分析的唯科学方法是有缺陷的,“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也就是说,根据我所持的理论,除了纯粹物质上和感官上的希望与喜悦外,都被破坏殆尽;没有人比我更加坚信,单凭这些希望与喜悦完全不足以使生活圆满。”^{[5]85}单凭“物质上和感官上的”东西,单凭外在的福利不能使生活圆满,于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我不再把外部条件的安排和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训练看作唯一的重要因素。”虽然他仍旧承认“知识教育的重要性”,承认“分析的力量与作用”,但如今,“感情的培养成为我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5]88}

在精神危机中,密尔曾深受“必然性”问题的困扰:“一种称为哲学上必然性的理论像梦魇似的压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自己好象已由科学证明是一个受过去环境支配的无能为力的奴隶;好象我的个性和所有其它人的个性都由我们控制不了的力量造成,我们对之完全束手无策。”但经过这番阅读、交游之后,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懂得,在自由意志理论中真正能鼓舞和提高人的精神力量的,是确信我们具有形成自己个性的真正力量;我懂得,我们的意志通过影响我们某些环境,就能增进今后使

用意志的习惯和能力。所有这些道理与环境论完全一致,或者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环境论。从那时起我思想中明确分清了环境论和宿命论的区别;完全抛弃必然性这个令人误解的名词。”^{[5]102}从这一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论自由》中得到集中阐发、影响深远的个性理论,这时已初步形成。

二 区分快乐的质与量,提出个性理论

走出这次精神危机,密尔真正成为一位思想家。他对边沁的功利主义予以重大改造,首先就是对快乐作质的区分。边沁说儿童的图钉游戏与对诗的欣赏是同等的快乐,密尔则说:“承认某些种类的快乐比其他种类的快乐更值得欲求,更有价值,这与功利原则是完全相容的。荒谬的倒是,我们在评估其他各种事物时,质量与数量都是考虑的因素,然而在评估各种快乐的时候,有人却认为只需考虑数量这一因素。”^{[2]8-9}密尔区分高级的快乐与低级的快乐,认为对幸福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高级的快乐、优质的快乐,即使这种高级的快乐在量上极小,不能令人满足,也比享受大量低级的快乐要幸福。密尔的名言是:“做不满足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因为苏格拉底享受的快乐量虽然微小,但却是高级的、优质的,于是在幸福指数上就远高于享有大量低级快乐的傻瓜。^{[2]10}

在区分快乐的质与量的基础上,密尔提出他的“个性”理论。个性理论是密尔对边沁主义的最重要的改造。边沁把人性归结为追求快乐,又把快乐作还原论的处理。他确立了七个标准去衡量各种苦乐的总量,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苦乐、幸福、功利都通约为一种感性快乐、肉身性的快乐。这种同质化的处理显然也意味着把人的生活都统一为一个模式了:人们所追求的快乐都是一样的,获求快乐的理性计算方式、理性行为方式也是一样的。这样就出现了密尔所说的人变成了一架机器,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在密尔看来,这种一元化、同质化的取向无视人的“个性”价值,是一种非常狭隘的人性观。所以密尔说边沁“忽视了真理的另一半”,就如同“独眼人”:“他对人的看法不超出最粗陋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他对性格多样性的认识也仅限于他碰巧了解到的。”^{[6]93-94}

密尔通过区分不同质的快乐,阻止了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把人生目的作同质化、一元化处理的取向,进而提出他的“个性”理论。个性理论正是《论自由》一书的主题,也是密尔对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在《论自由》中,密尔对人的“个性”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密尔强调,个人能够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目的、生活方式,并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这种选择的自主性造成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实践中,个人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实现个性的生活使人获得的强烈的、优质的快乐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所不能比拟的。实际上,高级的快乐就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生活方式的结果。

这样,在密尔这里,基于自己“内在力量”的自由选择能力,成为他的人性观的核心。如伯林所说:“居于穆勒思想与情感核心的,既不是他的功利主义,也不是对启蒙、对划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心(他自己有时也同意能够入侵私人领域,以促进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或公正),而是他的强烈信念:人之为人在于他的选择能力——同等地选择善恶的能力。”^{[1]269}“对他来说,人之有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既不在于拥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了工具与方法,而在于能选择,人在选择而不是被选择时才最成为自己;人是骑士而非马匹;人是目的的寻求者(而不仅仅是手段),并以他自己的方式追求目的。”^{[1]252}这些看法,了解康德的人自然极为熟悉,它听起来是如此地“康德主义”。萨拜因就说:“密尔伦理学的中心道德观念同康德的一样,是真正尊重人,是待人必须充分顾及其道德责任相称的尊严,没有这种尊严就谈不上道德责任。”^{[6]785}

伯林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结尾中说,密尔把“自由选择与自由试验”的能力作为人与其它自然事物的根本区别,“在他的所有观念中,只有这个观念使他获得永久的名声。”^{[1]285}“这个观念”的充分结果就是《论自由》一书。在《论自由》中,人的个性化和生活方式、生活价值的多元化、多样化得到充分论证,这使自由主义理论超越洛克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义,对随着民主时代的来临而渐行肆虐的“多数人的暴政”以及20世纪的人类梦魇——极权主义,能够始终保持可贵的批判能力。密尔对自己

的这种理论成就也十分得意,在《自传》中,密尔这样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论自由》看来比我其余作品会传世更久”。^{[5]147}也主要是因为《论自由》一书,密尔才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的圣徒”。

三 新的问题

密尔对边沁理论的发展固然使功利主义摆脱了一些困境,但同时又使功利主义面临一些新的问题。首先就是密尔对快乐质与量的区分动摇了功利主义的根基,使功利主义的面孔变得相对模糊起来。在密尔那里,高级的快乐主要是一些精神性的,事关道义、尊严等方面的“快乐”。如果快乐是以质为首要原则来区分的,那么这样的高级快乐即使是微小的一点,也值得人们舍弃大量的低级快乐去追求,它几乎成为了压倒一切的道德上的“王牌”——这种取舍的过程对人们来说,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样一来,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一贯表述就很相似了,功利主义不再是一种特色鲜明的与道义论相对峙的理论了。

另外,密尔从未宣称放弃功利主义的基本立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类的功利主义原则他也一直挂在嘴上,写在书里,但在密尔所宣称的理论前提与随后得出的具体结论之间,并无明确关联,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有所矛盾,这是密尔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他倍受质疑的地方。萨拜因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写的书都遵循一个公式。几乎关于每一主题,他大约都以一项总的原则叙述作为开场白,从字面到内容看起来都好像是他父亲写的那样刻板、抽象。密尔以此表示他忠于先人的教条之后,却作了让步和影响深邃的重新阐述,以致有鉴别力的读者不会不产生怀疑,原有的说法是不是已经被堵塞掉了。”^{[6]777-778}很明显,这个特点与密尔二十几岁时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萨拜因指出:“从广义上说,密尔的哲学在于借鉴康德哲学和康德后德国哲学的各种不同的观点以努力修正培育他的经验论。”借鉴欧陆哲学思想以修正自我是19世纪英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密尔可

以说处于这个潮流的开端,到19世纪后期,在以格林(T. H. Green)等为代表的牛津唯心主义者那里,这个潮流才得以完成,他们公然宣称以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为基础。密尔的思想毕竟是深植于英国传统之中的,“半途出家”的性质也使他“未能同时具有实现将如此异常不同的哲学真正有条理地综合起来所必须的把握或创见”。^{[6]777}

不过学术思想的价值并不是以体系本身是否严整、一贯来衡量的,而是看它是否契中人性与历史的事实与病症,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引导。从这个意义来说,密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近现代人的良师益友。萨拜因的说法颇有见地:“要对他的理论作系统评判可说是轻而易举,却毫无实际价值。”“他提出的具体界说而不是理论才真正体现其哲学的含义。”^{[6]778}英国经验主义本来的特点也正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这个特点在密尔身上也有典型体现,比如他的《论自由》中,就充满着从生活经验中来的智慧洞见,不是仅凭某某主义的框架就能把握的,必须仔细看他的具体说法。

参考文献:

- [1] 以赛亚·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2] 约翰·穆勒. 功利主义[M]. 徐大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 边沁. 政府片论[M]. 沈叔平,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8.
- [4] Mill, John S. *Essay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99-100.
- [5] 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自传[M]. 吴良健,吴衡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6] 乔治·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下册[M]. 刘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卫 华